

实践与学习

1 9 4 1

學習與實踐

潘梓年著

1941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

（定價四角）

著	者	潘	梓	年	等
出	版	者	正	光	社
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局	

目 錄

學習什麼？怎樣學習？.....	梓 年 (1)
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許滌新 (14)
研究新哲學的方法問題.....	劉亞生 (23)
怎樣應用理論於實際問題.....	孫 蘊 (27)
學習理論與實踐.....	曉 周 (33)
論大後方的學生工作.....	余莫文 (37)
論生活習慣.....	馮文彬 (44)

學習什麼？怎樣學習？

梓 年

抗戰把中國推進了一個大時代。這個大時代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是中華民族淪為奴隸，趨於滅亡，還是爭得獨立解放，建立自由幸福新中國的關頭，是被舊社會拉住，被日益墮落腐朽，跑步走入坟墓，已到了垂死階段的，以掠奪戰爭為其唯一的續命湯的舊世界拉住，與之同歸於盡；還是向新社會奔去，向日臻繁榮強盛，人人都過着快樂幸福的日子，前途光明無量的，為人類和平而奮鬥着的新世界奔去，與之同登衽席的關頭。生當這個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尤其是為新生一代的中國青年朋友們，應當以適逢其會為莫大的光榮，因為中國將由我們而再生，使中國脫離苦難步上康莊大道的光榮担子要由我們的鐵肩來擔起；中國歷史將由我們而劃出一條顯明的界限，在這界限的一面是「山窮水盡疑無路」在這界限的另一面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然而，抗戰不是陽關大道，也不是微波蕩漾的溪流。它是一隻洪爐，它是濁浪滔天的大海，它是荊棘叢生的莽原一片。要經得起烈火的鍛煉才能成為鋼鐵，要吃得住驚濤險浪的沖激才能乘風破浪到達彼岸，否則就要變為灰燼，否則就要中途覆沒。橫阻在抗戰勝利的路途上，需要我們去搏鬥的，不只是日寇的殘暴軍隊，還有日寇的惡毒陰謀，還有甘作日寇奴僕的漢奸羣醜；成為我們敵人的，不只有外來的日

本帝國主義壟斷，還有自己內部的歷史渣滓；抗戰勝利，不只需要戰勝敵人，還需要戰勝抗戰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障礙與困難。中國的人民，尤其是青年朋友們，生當這個大時代固然是莫大光榮，然而，這大時代給我們擱在肩上的担子却是異常沉重的，所要我們完成的任務却是異常繁複，異常艱苦的。

現在抗戰已快到三年，距離勝利當然已較前為近，但敵人的陰謀詭計是更為花樣繁多，更為陰險毒辣了。歷史渣滓，泛起得更多，動蕩得更甚了。一些官僚政客，貪污土劣，買辦奸商，都成了敵人「以華制華」，「以戰養戰」這種陰謀毒計的執行人，而為抗戰過程中一切困難障礙的根源，而妥協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險，就由此加深。堅持到今天的抗戰，已為勝利奠下了初基，我們須要在這基礎上來完成勝利的偉業，且使之澈底，使中華民族獲得真正的獨立解放，建立真正自由幸福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這一方面就得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同時還得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所謂抗戰必須同時建國，其意義就在於此。

這樣一種抗戰建國的任務，在今天，比在抗戰初期更為繁重而艱苦。為要完成這一任務，除了必須抱着堅強的決心與信心外，還須千百倍的提高自己的警覺性，千百倍的增強自己的能力，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從這個觀點上來提出中國人民尤其是青年朋友們的學習問題，那我們可以說，是我們目前非常必要的一個問題。

為了認清國際形勢風雲變幻的本質需要學習，為了洞察敵偽漢奸的陰謀毒計需要學習，為了克敵制勝需要學習，為了清除自己內部的歷史渣滓，排除抗戰過程中的一切困難障礙更需要學習。學習對於今天的全國人民都是非常重要，尤其對於青年更為重要；青年是中國新生一代的主人，不特今天抗戰建國的事業要他們來參加，而抗戰勝利後長期建國的任重致遠，更是落在他們的肩上。他們要懂得在抗戰期中要怎樣來堅持團結，堅持進步，他們更要懂得在抗戰勝利後要怎樣去仍然堅持着團結，堅持着進步。

那麼，青年朋友們應當學習些什麼呢？要怎樣去學習呢？這是更重要，更中心的問題。

很自然地，在我們腦中想起的第一個問題，是學習革命理論的問題。

如果學習革命理論，僅在於牢記，引證革命書籍與小冊子裏的一些原理原則及其個別結論，那問題當然就很簡單。但這樣談學習是非常危險的。譬如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一種革命的理論，而汪精衛却也在大談其「三民主義」，而且還說他談的是「正統的三民主義」，在敵人卵翼之下去大掛其「國民黨正統」的羊頭，大賣其「親日反共」的狗肉。這不是荒天下之大唐嗎？譬如馬克思主義更是全世界唯一的革命理論，却有一些托派無恥之徒，掛起「馬克思主義」的羊頭，實賣其破壞團結分裂抗日戰線的狗肉。這更是荒謬絕倫。因此，學習革命理論，不特要能學會革命理論的活用，同時要學會鑒別革命理論的偽造。學習革命理論，不只要研究革命理論的經典，同時要研究討論革命理論的各種論文而識別其真偽。

革命理論，就是科學的理論，所謂科學就是找尋真理。但真理並不是每一個人所能找尋，也不是博學多聞的智識分子所能找尋的。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及其切身利益，常常會拖住了他，使他完全喪失了找尋真理的能力，完全喪失了對於真理的感受性。當德法戰爭時，有個維也納的工廠家梅耶先生（Meyer）就曾力言過當時德意志的所謂知識階級，已完全喪失了那種一向被稱為德意志的世襲財產的所謂「大的理論感受性」，但這種感受性，却在當時的德意志勞動階級中復活起來了。這是因為真理是現實的客觀世界在主觀上的完整反映，而現實的客觀世界是在不斷地發展着、變化着。在社會上佔着優勢地位的人們，其利益不利於現存社會的變化與發展，而利於現存社會的停滯與永存，因此，他們對於真理就不會愛好而要嫉視，他們對於真理的找

尋能力以至對真理的感受性，就自然而然地逐漸喪失殆盡。而勞動階級的利益却正在要求現存社會的發展與變化，所以在他們中間復活起了「大的理論感受性」。

遠在一八七三年，馬克思就把這種情形明白指點了出來。他說：「經濟學，在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限度內，換言之，即不把資本主義秩序，視為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却把它視為社會生產之絕對的最後的形態的限度內，它只有在階級鬥爭仍在潛伏狀態中，或仍為間或發生的現象時，可仍為科學」。例如英國古典經濟學，是屬於階級鬥爭尚未發展時期的，因而它的一位最後的偉大代表，李加圖，尚能素樸地承認階級利害關係的對立（即工資與利潤的對立，利潤與地租的對立），是社會的自然法則，他還意識地以這種對立為研究的出發點。到了一八三〇年，英國資產階級的政權地位已達到了頂點，它在政治方面已完全戰勝了各政府與各封建諸侯，在經濟方面已完全戰勝了貴族土地所有者。從此以往，無論在實際方面或理論方面，階級鬥爭都已日益採取公開的威嚇的形態。於是「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敲起來了。從此以往，成為問題的，不是真理非真理的問題，祇是於資本有利或有害，便利或不便利，違背禁章或不違背禁章的問題。超利害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真正的科學考察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歪曲的良心與邪惡的意圖」。即使還有一些學者，受着當時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不願單為支配階級辯護，不願單向支配階級獻媚，仍相當要求科學意義，他也只能嘗試着「以資本的經濟學，和已不能忽視的無產者的要求相調和」，而產生一種淺薄的折衷派的經濟學，如約翰·穆勒那樣的經濟學。

所以，馬克思說：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只能是一種外來的東西，而不能有自己的國貨。因為德國經濟學者的時運不佳，「當他們能够公平研究經濟學時，近代的經濟關係在德國還缺少現實性。而這種關係生出之後，在資產者視野之內，已不許再有公平的研究了」。

這樣，真理永遠是前進的東西，而科學就永遠只能是向前猛進的集團所能有的東西。我們爲了學習革命理論而去閱讀各式各樣書籍，小冊子與形形色色的論文時，只要看它是在替社會上那種人說話，在替那種人的利益辯護，就可以判明它所爭論的是真理非真理的問題還是『領津貼的論難與攻擊』；是科學的研究還是『辯護論者歪曲的良心與邪惡的意圖』。中國有句古話說『狗嘴裏長不出象牙』。這就是說，狗所認爲真實的東西只是飼養它的主人的利益，此外一無所知。

其次，在學習革命理論的書籍時，必須在形式上把敘述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分別開來。『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究這種種形態的內部關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於現實的運動，必不能有適當的敘述。但敘述一經成功，材料的生命一經觀念地反映出來，那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馬克思）。就是說，在我們閱讀革命理論的經典時，我們應當覺醒於其中一些已經成功地敘述出來的結論和原理，並不是『一個先天的結構』，而是首先經過了豐富材料的搜集，對這材料作種種發展形態的分析，探究了這種種形態的內部關係以後，才把某一個現實的運動適當地敘述出來。如果只是誠心地讀熟一些敘述形式中的原理與結論，而不會進一步去追究這個敘述所由成功是經過了怎樣豐富材料的分析研究，那你會把它當做教條而希望它『將能適宜於任何環境，將能適宜於一切實際情形』，那你就會成爲『咬文嚼字者和死讀書者』。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例如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底寫了一本『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其中有這樣一句話：『民族的鬥爭就是資產階級相互間的鬥爭』。這樣一個結論，在斯大林寫成那本書時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那時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還未發生，『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來的民族自決的基本要求，還沒有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部份，而完全的把它們當成了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一部分。』這個結論是根據了那時候關於民族問題許多方面的豐富材料，對這些材料加以分析探究以後，而把民

族鬥爭這個「現實的運動適當地敘述」出來的結論。但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國際形勢已起了根本的變動，歐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一部份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所以列寧在他寫的『民族自決問題討論之總結』一書中就說：『民族問題的基本點——民族自決問題，現在已不是民主運動的一部份，它已變成整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了』。而舍米契在一九二五年三月討論南斯拉夫民族問題時，却還引證斯大林那句「民族的鬥爭就是資產階級相互間的鬥爭」的話，作為「不願意把民族問題在實質上看作是農民問題」的根據。這就是舍米契沒有弄清楚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的區別，只看到一句敘述形式的結論而沒有去看這個敘述所由成功的對於豐富材料的分析研究，以致他的引證完全離開了空間與時間，離開了活的歷史環境，『破壞了辯證法的基本要求』。這個基本要求是：『一切都以條件，時間以及地方為轉移』。

二

第二個問題是學習一般知識的問題。學習革命理論是武裝自己的頭腦，提高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對自己肩上的担子能够勝任愉快。所以對於革命理論的學習是要精通而不能只是涉獵。於是我們就遇到了第二個問題：精通革命理論是不是就是去吸收一切科學的革命理論教本，小冊子以及巨著裏面所包含的知識之總和呢？列寧回答我們說：這樣一個研究革命理論的定義是太粗淺太不妥當了。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他對全蘇聯的青年講學習問題時說，『馬克思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怎樣從人類知識總和中產生出來的一個實例』。他說，『如果你要問，為什麼馬克思底學說會緊緊抓住最革命階級的千百萬人的心呢，那你只能得到一個回答：因為馬克思是站在資本主義下人類所獲得的知識的堅固知識之上』。他說，馬克思所以能發現人類社會發展的法則，認清楚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走到共產主義，『主要的是，他根據

了對於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做了最精確，最詳細而且最深入的研究，才證明了這一點，而他所以能够如此，又因為他對於一切從前科學所教授的東西都完全融合貫通了」。因此，他對於斥責與非難舊學校的人說：『據說舊的學校是喂鴨式的，強迫學習的，而在學習上又是生吞活剝的。這是實在的；可是，我們必須區別舊的學校什麼是壞，什麼又是於我們有用的，我們從其中選擇共產主義所需要的東西』。『我們必須從舊的學校中採取好的東西』。他說，『如果……說一個人可以不須獲取人類知識所積累的東西，就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那便犯了很大的錯誤。如果以為學些共產主義的口號，共產主義科學的結論，就够了，不須獲取共產主義所產生的知識底總和，那就錯誤的』。

列寧這個指示，對於我們目前的許多青年朋友們是非常合時的。我們常常聽到、看到，許多青年學生，斥責自己的學校沒有抗戰教育，深致不滿，因而消沉、萎靡，以至成批的從學校逃跑。對的，這是事實：現在有許多學校是一種喂鴨式的學校，它強迫學生去吸收一大堆無用的、冗贅的、不能給社會一點益處的知識，這些知識，困累人的腦筋，把青年人都變成了放在模型裏鑄造出來的辦事員。現在一般的學校教育太不合於抗戰的需要，致使『青年的心在戰爭中也漸漸染上麻痺、消沉、萎靡，……的毛病』（大公報「五四」社論）。我們要向教育當局要求改善教育與訓練青年的方法，要求實施抗戰教育，要求對於青年「少干涉，多培養」（同上），給青年以讀書閱報的自由，結社研究，開會討論的自由，「把握住青年的心，不使他們麻痺、消沉、萎靡，……讓他們更活潑更熱烈起來」（同上）。但如果由此便想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說除了抗戰知識以外，其他的一切就可以不要，那就是錯誤的。如果以為這種學校無書可讀，無知識可求而消沉、萎靡，以為這種學校沒有呆下去的必要而逃跑出去，那就更是錯誤。「我們不需要喂鴨，但我們真正需要用主要事實的知識來開發青年人的心智，使臻完善。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所獲得的一切知識

不在他心裏融會過，那他不過只會成爲一個吹法螺的人，而共產主義也就成了空談，成了僅僅一塊招牌而已。你不僅要融會這些知識，而且需要批判地融化它，以便不使無用的材料填塞你的心智，而使一個現代有教養的人所不可少的實際學問去豐富你的心智』（列寧）

總結起來，就是說：爲了精通革命理論，必須獲取人類知識所積累的東西，必須要具有一般的知識；目前學校雖然不能使我們滿意，要求它有根本的改善，但我們必須區別什麼是壞的，什麼是於我們有用的，我們必須從其中採取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三

其次是學習工作，從工作中學習的問題。列寧說：「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沒有經過很多認真艱苦的工作，也不了解那些必須批判地觀察的事實，只學得了一些現成的共產主義結論，便把他底共產主義拿來誇耀，那末，他就是可哀的共產主義者。這樣的淺薄是絕對可悲的」。這就是說，一個革命工作者，不只需要學習革命理論，同時還需要「經過很多認真艱苦的工作」，去「了解那些必須批判地觀察的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革命的理論變成「物質的力量」，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理論。否則就是一個「淺薄可悲的」革命者，是一個「革命的」空大砲」。斯大林講到列寧主義者的工作體裁時，說這體裁有兩個特點：第一，就是俄國的革命規模；第二，就是美國的求實精神。俄國的革命規模是這樣一種消毒藥，它「可以消除一切消極態度，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盲從祖先傳統態度」；是這樣一種活力，它「喚醒人的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物，開展前進」。美國的求實精神是這樣一種消毒劑，它「可以消除「革命的」癡想主義及幻想的杜撰主義」；是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什麼障礙」，它「以自己的求實的堅忍精神去掃除所有的各種各樣的障礙」，它「只要已經開始做某種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這兩種特點一定要結合在

一起。「如果不把美國的求實精神和俄國的革命規模結合起來，那末，它就很有可能腐化爲狹隘的和無原則的實際主義」，「近視的實踐主義」，「無頭腦的實際主義」。這種「無頭腦的實際主義」的毛病，就是「充滿着意志，和實際行動的堅決性，「幹得」很「起勁」，可是沒有前途，不知道「究竟爲什麼」；因而迷失了革命工作的道路」。如果不把俄國的革命規模和美國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那末，它就很有可能在實際中腐化爲一種空洞的「革命的」癡想主義」，「「革命的」杜撰主義和「革命的」設計主義」。這種「革命的」設計主義的毛病，就如愛倫堡所描寫的「盡善盡美的共產主義人物」那樣，「立意擬好了一個盡善盡美的人物底標準表格，……而在這個「工作」中「淹死了」」。

列寧對於這種「革命的」設計主義者，曾經痛下鍼砭，說：「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平常的日常工作……。少發些政治的噪聲，多注意些極平常的，可是實際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

青年朋友們。我們參加抗戰建國工作，不只要思想不停滯，不盲從祖先傳統，破壞舊物，開展前進，同時就還要用自己求實的堅忍精神去掃除一切障礙，要把已經開始做的某種事情，一定做到底；我們要少說漂亮話，多做日常工作，少發政治噪聲，多注意極平常的，實際的，抗戰建國的事實。

我們經常是聽到一些「政治噪聲」，訴說着工作條件的困難，政治環境的惡劣，說必須要「轉移陣地」，以便得到適當的訓練，使自己能把自己的力量發揮出來貢獻於真正的抗戰建國的等等。對的，這是事實：有些地方的工作條件確是困難，有些地方的政治環境確是惡劣，爲着抗戰建國的必勝必成，我們要向政府呼籲給人民以抗戰的自由，工作的自由，言論、結社、集會等等的民主自由。但如果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必須要轉移工作地點，要在順利的政治環境下才能把自己的力量貢獻於抗戰建國，那是不正確的。抗戰建國，正就是需要全國朝氣勃勃的青年去「經過很多認真艱苦的工作」，去「了解那些

必須批判地觀察的事實』，去『用自己求實的堅忍精神掃除所有的各種各樣的障礙』。沒有這一些，抗戰建國的必成必勝是不會『從天而降』的。

我們再來看看列寧當年是叫全蘇聯的青年去做些什麼日常工作吧。他叫他們去教勞動青年大眾識字，去自己學會了『從經濟上復興全國』所需要的現代科學技術再用以教給勞動青年大眾；他教他們去幫助農民『發展菜園』，使菜園的數目增加起來，面積擴大起來，收穫也進步起來』；他叫他們『組織青年軍隊去幫助保持清潔或分配食物，去有系統地挨戶致察，去有組織地爲全社會的利益而工作，適當地分配力量並且要表現出勞動一定要是有組織的勞動』。他說，『這也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個任務』。因爲當時『每個人都單獨爲他自己工作，沒有人去注意是否有衰老或疾病的，是否一切的家庭工作都壓在婦女肩上，這些婦女因爲家務關係是生活在被壓迫被奴役的境地裏的』。列寧說，『反對這些現象，乃是青年團的職責』，『我們要改變這一切』！那麼，目前我們的抗戰建國，不正有千百萬的文盲需要有人去教他們識字嗎？不正有許多抗屬婦女，衰老，疾病，需要有人去幫助他們料理家務，發展菜園嗎？不正有許多生產事業，農業，小手工業，需要現代的科學技術去幫助改進嗎？如果『充滿着意志和實際行動的堅決性』的青年都從這些工作地方離開，那末，這些工作讓誰來做呢？難道都叫它們變成了『荒涼滿目的年份』嗎？

是的，青年是首先需要得到適當的培養與訓練，才能有方法有能力去從事於工作。但是，培養與訓練，不只是在學校裏，訓練班裏可以得到，『經過許多認真艱苦的工作』去『了解那些必須批判地觀察的事實』，也可以使自己得到相當的培養與訓練。不要把工作條件的困難看做無法克服，把政治環境的惡劣當作不可戰勝。魯迅說：『路是踏出來的』。我們不是在柏油馬路上開汽車的司機，而是披荆斬棘鑿山開道的石工。我們四周的現實就是我們的課本，歷史課與我們的任務就是去認識這個現實，了解這個現實，改變這個現實。『我們要

改變這一切」！

使青年們嚮往的那地區，那裏的政治環境與進步氣象，講起來確是要使人豔美的。但是，請回想一下當年當地的政治環境與工作條件吧，其困難與惡劣恐也不減於今日的其他各地。那裏今日的進步，順利，雖然是由政治上的特殊條件而飛躍地出現了，但這裏我們是不能忘記當年許多革命青年艱苦奮鬥的勞蹟的。今日的光明，正就是從昨天的黑夜裏衝出來的。

請堅信着吧，朋友們！在歷史的大時代中，抗戰一定要進步，不進步就無法堅持下去，無法幸獲勝利。我們堅忍地多多經過一些認真艱苦的工作，去多多了解那些必須批判地加以觀察必須堅決地予以改變的現實吧！

從工作中學習，不只要學習一些工作方法，主要的還是要研究工作對象，研究工作上所遇到的那些障礙與困難。

四

最後是學習團結的問題。團結，是堅持抗戰的基本條件，尤其是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的基本條件。我們用以斷定抗戰必能勝利建國必能成功的，是我們人多、地大、物博、敵人人少、地小、物貧。這是要以團結為前提的；只有團結，才能把人多物博，變成雄偉的力量，否則人多恰所以供敵人『以華制華』，地大物博恰所以供敵人『以戰養戰』。我們說抗戰一定能够勝利建國一定能够成功，是因為我們的抗戰是進步的戰爭，是可以得到國際方面的援助，而敵人則反是。這也就是指我們能够團結而說的，如果不能團結，就是表明我們不願進步，不能進步，那國際方面願意援助的友邦就要因此縮手，而一些坐收漁翁之利的國際陰謀家倒要磨拳擦掌起來了。

直到今天，我們內部的團結，還沒有能够說『已無問題』，相反的，上面籠罩着的一層陰霾是在濃濁起來。這，我們首先自然要要求各抗日黨派的領袖，尤其是國共兩黨的領導人，日夕惕勵。然而，中

國的主人翁，終究是中國的人民，人民有要求各抗日黨派團結的權利，也具有促使它們團結的力量。全國人民不能坐視各黨派之團結與否，認為它們能夠團結自是國家之福，否則就只有自歎灰氣；相反的，中國的命運是操在中國人民自己手裏，人民自己如能團結起來，如能團結得鞏固，就不怕有什麼黨派不願團結，破壞團結。汪精衛是一個例子，他不願團結抗戰，要投降，要反共，要破壞團結，人民就有充分的力量把這國賊趕出去，同趕走日本強盜一樣。因此，我們要求抗日黨派團結，不是坐着等候，而是要用人民的團結來促成它們的團結。

除非先進的人民尤其是先進的青年，把全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工農大眾團結在堅持抗戰的旗幟之下，中國是不會有鞏固的團結的。

在這裏，我們首先討論一下抗戰建國的倫理問題。

有沒有抗戰建國倫理這樣東西呢？有沒有抗戰建國道德這樣東西呢？當然是有的。抗戰建國的倫理與道德，不是什麼人什麼派對於什麼人什麼派守不守信義的問題，而是什麼人什麼黨服從不服從抗戰建國的利益的問題。汪精衛對於日寇軍閥非常守信義，非常服從。我們能不能說他有道德呢？不能的。以前曾經做過汪精衛的好朋友的先生們，我們能不能要求他們對汪逆堅守信義呢？不能的。我們的倫理與道德是完全服從於抗戰建國的利益的。我們的倫理與道德完全是從堅持抗戰認真建國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誰能堅持抗戰，誰能認真建國——從敵人手裏把國土奪回來，從落後狀態中把社會事業人民生活改進起來，我們就贊助他，擁護他；誰要走向分裂，誰要阻撓進步，我們就反對他，打倒他。這就是我們的倫理，這就是我們道德的最高原則。

進步的青年們要去團結全國的青年工農大眾，就是要用這種抗戰建國的倫理去浸潤他們。學習團結，就要學習這種倫理，研究這種的原則。

妨礙着人民大眾鞏固團結的有貪污土劣。他們妨礙着政治進步，

妨礙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就妨礙着人力物力的動員，更妨礙着人力物力的愛護與培植使抗戰力量從基礎上增加起來，發展起來。

妨礙着人民大眾鞏固團結的還有各式各樣的大小漢奸。他們散佈失敗主義，製造和平空氣，削弱人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侵蝕着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他們充當敵僞爪牙，吸取我們的物資與財力，誣蔑我們的進步力量，陷害我們的積極青年。

學習團結，就是要去研究這些團結的障礙物，看清楚爲他們所依存的是些什麼東西，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從根本上使他們無法存在，無法施展其鬼蜮伎倆。團結人民大眾，就是要去教育他們，訓練他們，幫助他們團聚集結自己的隊伍，發揮自己的力量，堅決地反對貪污土劣，嚴密地舉發，打擊，驅除各式各樣的大小漢奸，堅決地保衛自己的團結，鞏固自己的團結，爲抗戰建國而奮鬥。

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並不能算是難事，因爲它是「外患」。趕走一個汪精衛，也不是什麼難事，因爲他自己早就自絕於國人了。可是，反對貪污土劣，驅除大小漢奸，就要困難得多了，因爲這是「心腹之患」，繁殖在社會的每一角落裏，隱藏在形形色色漂亮的外衣之下，方法稍有不當，就或者自己爲它所反噬，或者團結無從建立起來。然而，貪污土劣如果不消滅，大小漢奸如果不驅除，那團結就無法鞏固起來，抗戰就無法勝利，建國就無法成功。

「道德的目的是幫助人類社會升到更高的水平」（列寧），消除一切阻撓進步的障礙。抗戰建國的道德，其基礎就是爲鞏固過去的戰果和完成抗戰建國的事業而奮鬥。這也就是教育和訓練人民大眾的基礎。這也就是怎樣學習團結這一個問題的答案。

作爲一個進步的青年，就必須去組織和團結廣大的工農青年，並且在這樣的奮鬥中立下一個道德的模範。

「只要我們學會鞏固團結，我們就會在將來的鬥爭中獲勝。而且，——在有了力量之後——要變成真正無敵」。（列寧）